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

THE RESEARCH OF ZHANG DONGSU'S CULTURAL VIEWPOINTS

左 玉 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

左 玉 河 著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ISBN 7-5004-2088-9

I. 张… II. 左… III. 张东荪-文化-学术思想-研究 IV. G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97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育才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29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18.00 元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书目

1994 年度

《魏忠贤专权研究》，苗棣著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著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王中田著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

1995 年度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吴霓著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郭润涛著

《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著

《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主编

《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

《利玛窦与中国》，林金水著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年)》，吕昭义著

1996 年度

《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许 檀著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吴吉远著

《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著

《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

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序

王 桢 林

1949年在中国政界、学术界、教育界还非常活跃的张东荪(他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往西柏坡会见过毛泽东,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51年突然踪迹消失了。此后若干年间他虽然仍然活着,却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了。在他的踪迹消失以后,由于他一生中的若干事迹牵连到的历史无法不写,他的名字还是经常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书上。但他总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例如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在辩证法问题论战中反对唯物辩证法等。这样,一个曾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有多方面活动和成就的知名人物的完整形象就不见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发扬,学术界的思想大为解放,史学界有不少人力求用更广阔的眼光公允地观察过去的历史,于是人们发现了许多被掩盖着的被歪曲了的人和事,在这样的人和事中就有张东荪。

写成这本《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的青年学者左玉河是较早注意到张东荪研究价值的一位。他在河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注意收集张东荪的资料,并写有这方面的文章。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决定以张东荪为重点研究对象,学位论文写张的思想。但是张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大概包括哲学、政治思想、文化思想三个方面。他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很多论述,都有自己的见解以至思想体系。把张东荪的思想全部写出来,在三年期限内时间和精力

上都来不及,于是决定学位论文专写文化思想。论文写成了,这就是即将出版的这本《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

近代的中国和西方接触以来,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做了种种观察,提出了种种论调,如中国文化优越论、中西文化调和论、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以中化西论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是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见解。

中国思想界热烈讨论文化问题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而张东荪一生若干重要著作,如《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知识与文化》、《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 40 年代完成的。40 年代可以看做张东荪思想的成熟期。就文化问题来看,30 年代非常热烈的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因全国进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低沉下去。抗战结束以后国内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政治方面,无暇关注文化问题。张东荪关于文化问题的见解是在这种低沉的情况下发表的,在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注意。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经济建设、国内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国际上的斗争,淹没了一切,文化问题还值得一顾吗? 1978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现代化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当人们考察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发展前景及其障碍的时候,除了别的问题以外,又发现了一百多年来提出的讨论过而未解决的中西文化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这样的老问题。于是在 80 年代思想界又一次出现了文化热。这一次文化热,从总体上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 30 年代。展望未来必然要回顾历史(如果历史上有过类似情况的话),于是过去的争论,过去各个代表人物的见解,又被人们翻检了出来,加以重新研究和评价。只是在这时人们才注意到了张东荪的文化思想。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张东荪的文化思想有他考察的重点,有他关心的问题,即和近代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分不开,又有他自己卓越的见解。左玉河在书中揭示了以下几个方面:(1)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属于两个不同的学术研究范围,而张的文化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中间桥梁。他把哲学、政治理论与文化思想统一了起来。(2)张晚期的文化观可以称为“西体中用”论,即以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为体,以儒家的内心修养方法为用。这不同于“全盘西化”论,也不同于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3)张东荪曾经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文化问题,指出文化对知识(思想)的限制,即“文化境况”对人们思想具有决定作用。这是他的“文化限制”理论。(4)张东荪认为中西文化既有“古今之异”,又有“中外之别”。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西社会境况的不同所致,同时也是中西思想的“底格”(范畴)所造成的。关于后者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范畴种类上侧重点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思想倾向上的差异:西方注重“质”与“体”,可以发展为形上学、物理学和化学;中国注重“本”与“末”,只能转向与秩序有关的学问,发展为“天人关系”的宇宙观和“彻底的中心制”的社会组织论。张还从中西道统的不同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对中西文化作比较研究的目的,不是站在一方排斥另一方,而是寻找中西文化结合的生长点。(5)张东荪研究文化问题,对中西文化作比较研究,其最终目的是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因为文化与政治不可分,文化出路也就是政治出路。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出路是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以上这几点并不足以全面概括作者阐述的张东荪文化思想,当然更不能全面概括张本人的文化思想;但仅仅这几点足可以看出张的文化思想:(1)是有体系的;(2)是有丰富内容的;(3)观察分析是深透的,其中有些在今天还未达到那种程度;(4)提出的命题、

作出的结论是富于理论性的,其中有些超出了今天的认识水平;(5)是体现了正义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的关怀的。正如作者所指出,张的文化思想是极具创造性和有很高学术价值的。

但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是完备无缺的,都不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都不可能把所有涉及到的问题全部解决的,都不会是人们完全同意的。张东荪的思想当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文化思想决不因此而逊色,他的理论贡献决不会因此而埋没。

左玉河这本书是系统研究张东荪文化思想的第一部著作,它的价值如何当由学术界去评论。我在这里衷心希望他写出更高水平的张东荪研究著作来。

1997年6月28日于北师大

导论：一个“不能忘情于政治”的哲学家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圣心”作笔名发表文章，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皋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1843年升泰州知州。1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禾（1839～1916），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在父亲及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

190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辩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①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发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②。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1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世德同住在东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

①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② 《新哲学论丛》序。

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①

1906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9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2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②但因他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③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

① 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

②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③ 《新哲学论丛》序。

《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30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贤人政治》的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1918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①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191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溯初通宵畅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

① 《理性与民主》序论。

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①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暂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②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勱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等大量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发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超、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1920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等对此文进行批驳,由此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君勱、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0年7月15日。

我们的忠告》、《长期的忍耐》等文章,进行反驳。1920年1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19日,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月1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1921年9月16日,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在《宣言》中,公开宣称:“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全面提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传目的;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越来越小。1922年6月和9月,《社会主义研究》和《改造》杂志相继停刊。

1920年,张东荪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他自任大学部主任,聘请国内名流做教授,后因经费困难而辞职。对于他在中国公学的情况,他的好友俞颂华回忆说:“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①

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

^① 俞颂华:《论张东荪》,上海《人物杂志》第2卷6期,1947年6月20日。

入西方文化”。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沈痾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真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① 所以，张东荪输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学。1921年12月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1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1923年发表《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论理主义》、《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伯洛德的感相论》，1924年发表《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1925年译介英国哲学家卡阿著《科学与哲学》，1928年发表《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摩尔根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

1923年2月，张君勱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之解决惟赖玄学。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反驳张君勱的观点，展开了关于人生观问题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论战”）。6月9日，张东荪发表《劳而无功》一文，站在玄学派一边，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② 他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即拿科学本身来

① 张东荪：《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1号，1926年1月10日。

②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1925年1月25日。